

香港傳真

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08-45

2008年6月2日

當代中國改革中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潮

美國波士頓大學政治系 曹天子¹

2007年2月，謝韜在《炎黃春秋》發表題為〈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的長文，提出用“民主社會主義”代替“暴力社會主義”的主張，在學界和政界的一些精英中間引起了不少議論。在此前後，一些在輿論界頗有影響的人物，如李銳、高尚全、吳敬璉、江平、丁寧寧等人，也紛紛發表文章、通信或談話，從政治、經濟和法律，從理論、體制和社會發展等不同角度，用憲政社會主義、人民社會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等不同語彙，主張用民主社會主義來取代對社會主義的傳統理解，亦即主張換旗。一

¹ 本文是曹天子編：《社會主義還是社會民主主義？》一書的引言（香港大風出版社2008年4月出版），參見：<http://www.strongwind.com.hk>。

時間，民主社會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² 在一些精英中間，成了一個相當熱門的話題。

有些人覺得不可理解：在改革開放 28 年來年年月月反復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的領導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一黨制中國，以實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多黨民主為其核心主張的社會民主主義，怎麼居然成了一個熱門話題？可是，如果注意一下 28 年來中國社會發生的變化，那麼社會民主主義成了中共考慮今後走向時的一個選項，其實並不奇怪。

就中共的指導思想而言，首先，以公有制、計劃經濟與按勞分配為主要特徵的傳統社會主義模式，已為混合所有制的市場經濟模式所取代。實踐中，私有經濟的份額急劇攀昇；在改制的名義下，全盤私有化的勢頭咄咄逼人。而按勞分配，則為按要素分配所取代。其中，勞動者得到的工資，只是其勞動力再生產所需費用的必要補償；至於他們創造出來的剩餘價值，則按法律規定，統歸投資者所有。結果是，新生的資產階級³ 迅速成為一支強大的社會力量。

其次，“無產階級專政”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失去了階級內容，變成了程序性的“依法治國”。

再次，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主要體現在其最新成果初級階段論、三個代表（先進生產力、先進思想、全體人民）理論和科學發展觀（發展第一、以人為本）。其中，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主要

² 由於換旗派“民主社會主義”旗號中的“社會主義”，並不是一種取代資本主義的新的社會經濟制度，因而，正如換旗派的領軍人物明確指出的那樣，這一旗號與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沒有什麼區別。它的對立面，並不是“民主資本主義”，而是所謂的“暴力社會主義”，即那種不排除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以消滅僱傭勞動剝削為基本特徵、取代資本主義的新的社會經濟制度。

³ 在官方統計中，新生的資產階級通常被混同於白領、科技文體精英、專業人士和經營管理人員等勞動者，用籠統、含糊且缺乏階級內容的“中產階級”或“新社會階層”來指稱。

是資產階級，而無產階級則消溶於包括全體公民在內的“人民”之中。無產階級的階級解放和埋葬資本主義的歷史使命，則由於以生產力論為依據的初級階段論而逐漸淡出。

最後，中共已把自己從革命黨和無產階級的先鋒隊重新定位為執政黨和全民黨。

就整個中國社會來看，28年的改革開放，後果之一是出現了一個有著特殊利益的強勢群體，即所謂的“官學產媒精英聯盟”。這個集團中的體制內和體制外精英，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在利益上有同有異：在支持改革開放、反對停滯倒退時利益一致；但在如何處理改革開放中出現的難題困境、把改革推向何處等問題上，分歧不小。

社會民主主義思潮的出現，及各派精英對換旗的議論，只有放在上述政治~社會背景之中，才能得到恰當的理解。

比如，本來就對改革開放的方向持否定態度的傳統左派，把這一思潮的公開亮相和換旗宣言，看成是資改派（打著改革旗號搞資本主義的派別）完成資本主義復辟的決戰進軍號。他們忍無可忍、退無可退，只得背水一戰，以求保住他們在黨內最後一塊合法的理論陣地。於是利用話語權上的某種殘存優勢，開會聲討、徹底批判。可是，由於以“不批判”、“不炒作”形式出現的“不辯論”政策，這種殘存優勢的運用，也受到了極大的限制。更何況，這些長期被邊緣化的異議分子，在黨內還能有多少影響？

對於部分體制外的精英，社會民主主義綱領中的憲政民主，為他們打開了通向政治權力的大門，當然是歡欣鼓舞、堅決支持。不過，他們對是否換旗，並沒有多少發言權。

體制內的經濟精英，在改革問題上有重要的發言權；但對於憲政民主，沒有什麼興趣。經濟上的理想選項，本來是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不過，由於新自由主義指導下的

改革實踐帶來了各種惡果，近年來名聲極壞，不得已而求其次，也願意把社會民主主義的經濟綱領（資本主義的混合經濟），當作最終實現新自由主義的特洛伊木馬。但是，對於建立福利國家，他們決無誠意。⁴

體制內的政治精英，對中共走向和中國的改革走向，有著決定性的發言權。出於執政合法性的考慮，他們對於福利國家制度，比經濟精英更有誠意。可是其中的主流派，對於憲政民主，大體上只是虛與委蛇，沒有也難以有真正的作為。只有其中的非主流派，作為體制外精英在黨內的政治代表，才是全心全意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可是，他們的發言權也極其有限。

一些普通民衆也許對社會民主主義感興趣，但這並不是因為他們對它的理論、歷史和當前人們把它舉為旗幟的實際含義有多少了解認同；而主要是由於初級階段長期論的話語霸權，再加上蘇東劇變，使他們對實現經濟上消滅剝削的社會主義失去了希望；而社會民主主義的福利國家主張，怎麼也比實際生活中的新自由主義強得多。即使是一些對社會主義尚存希望的知識分子，也覺得在權貴資本主義橫行的時代，能實行社會民主主義的福利國家，作為走向社會主義的第一步，也還不錯。⁵ 至於在政治上實行憲政民主，吸引力就更大。

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嚴密關注黨內外思想動態的中共高層，對於“換旗”這樣一個極度敏感的話題，卻連續幾個月既不表態也無動作。這一事實本身就向各個政治派別傳遞出了一個耐人尋

⁴ 在北京CBD國際論壇上，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北京CBD國際論壇秘書長龍永圖說：“中國養老金問題不能全指望政府。正在步入老齡化社會的中國，僅靠政府買社會保險，遠遠不能為民衆提供足夠的養老保障。西方的經驗證明，政府大包大攬是不可持續的”（見《人民日報·海外版》2007年9月21日，第7版）。

⁵ 相當一些被稱為“自由派”（如李慎之和秦暉）和“新左派”（如王紹光）的知識分子，就持有這一立場。

味的信息，引起了各種解讀。直到謝文發表三個月後，中共高層才以報紙答問形式，做了個低調表態：社會民主主義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借鑒作用，但我們還要堅持黨的領導，不搞多黨制；⁶ 同時在輿論控制上，對社會民主主義繼續執行“不批判”、“不炒作”的政策。

幾個月後的中共十七大，基調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對於社會民主主義隻字未提。很多人據此認為：塵埃落定，大幕降下；一時間喧喧嚷嚷的換旗小戲，已經收場。可是，如果把換旗努力，放在中共演變史和當代中國社會變遷這些大的背景下略加考察，就會發現，十七大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並沒有結束辯論。恰恰相反，它只是為一場更廣泛更深刻的辯論、一場更為可觀的換旗大戲，拉開了序幕。

馬克思早就說過，人們在“演出世界歷史的新的一幕”時往往借用舊的語言。換旗派的“社會民主主義”，對於當代中國正在進行中的急劇的社會變遷來說，就是這樣一種從西方借來的、並不十分合適的語言；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卻好像是一種更合適、更有用的語言。不過，馬克思緊接著又說道：當“自以為借助革命加速了自己的前進運動的整個民族，忽然發現自己被拖回到一個早已死亡的時代”時，語言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就是一個有待觀察的問題了。

現在讓我們來看一下大的背景。

一、思想解放運動

中共主導的改革，其直接對象是毛澤東的理論和實踐；而其

⁶ 見曹天予編：《社會主義還是社會民主主義？》第二部分：〈官方立場〉。

決策層在指導思想上共識的達成，則主要通過思想解放運動。

對毛澤東迷信的破除、黨內思想從極左路線禁錮下的解放，第一個突破口當然是文革；接著是大躍進、廬山會議、反右和歷次政治運動；後來連三大改造似乎也搞早了，土改似乎也冒進了；到最後，毛時代唯一能夠留下來的正面政績，似乎只剩下了兩彈一星。至於 1949 年革命的基本成就，即剝奪了剝削階級權力的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強調平等、崇尚工農（為創造歷史的主人）的價值體系的確立，則很快就被鋪天蓋地的對於毛時代的種種罪行的批判所淹沒。

上昇到理論上，第一個突破口是階級鬥爭為綱和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三大改造後，剝削階級都消滅了，怎麼還能階級鬥爭為綱、到黨內找走資派來鬥？這豈不胡鬧？！文革確實是場鬧劇。但以鬧劇形式出現的文革，要解決的其實是個極其嚴肅的問題。反修防修，指的無非是防止革命政權蛻變為與工農敵對的異己力量、防止革命精英蛻變為新的剝削壓迫階級。這個權力異化問題的存在，對於自由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托派理論家和薩特等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其實是個常識：沒有先鋒隊的領導，革命不可能成功；可是成功後的精英們，大權在握，控制著國有（按列寧的說法是國家資本主義）企業的利潤及其使用，怎麼才能防止他們蛻變成特權階層（即通過政權、作為精英整體的一分子享有剝削成果）、防止他們化公為私、變成新的佔有私有財產的剝削階級？這是任何徹底的社會革命必須面對的一個難題。至於怎麼回答這個問題，卻是誰也不知道。這就是為什麼，當毛澤東發動文革動員群眾用“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來解決這個問題時，有些人對之期許甚高。

文革失敗了。但文革提出的問題卻並沒有消失。相反，由於對失敗了的文革的反彈，這些問題被掩蓋了起來甚至被徹底否認，

因而不但得不到適當的解決，反而變得更加嚴重、更加難以處理。不受制約的官員，上下通氣、官商一體；或尋租設租，或直接下海；或伸手要（可與西方老總匹配的）鉅額年薪，或熱衷於黑箱炒作改制，直接攫取國有資產，成為大資本家。所有這些，無非只是“權力異化導致新剝削階級產生”這一邏輯的具體表現而已。

在文革中受到衝擊的人們，對於文革及其理論基礎階級鬥爭為綱深惡痛絕，當然可以理解。但這一情緒，在理論上卻帶來了一個當時微妙但卻後果嚴重的、對於馬克思主義的重新解讀。那就是，階級分析在改革時期的中國馬克思主義中逐漸淡出，而生產力論則成了主要的理論視角。於是，社會主義被歸結為就是發展生產力；於是，人類歷史要以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來劃分為逐級上昇的一系列階段；於是，中國被認定為處於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因而必須歡迎資本主義、歡迎資本家對生產力發展所作的貢獻；於是GDP翻幾番（作為生產力發展的外部指標）成了中共執政合法性的主要根據；於是，發展、效率成了社會政治生活中的主要話題，等等，等等。

在實際生活中，從無休無止的政治運動和階級鬥爭中擺脫出來，轉向四化建設，在文革結束之初，得到了人們的擁護。四化，本來指的只是社會主義制度內技術層面的現代化。可是，由於特定的歷史語境，這一技術層面上的目標口號，卻引發了一場話語霸權的大轉移。這裡說的“特定的歷史語境”，指的主要是：（1）改革開放後與西方世界的直接接觸；（2）思想解放運動打破了各種禁忌，引發了強烈的好奇心。於是，以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為基調的形形色色的經濟、社會、政治、歷史理論，包括現代化理論，被大量引入；（3）馬克思主義本身被簡化為生產力論。這裡說的“話語霸權大轉移”，指的就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失去了它的指導地位，取而代之的是西方的現代化理論。這一話語霸權

的轉移，說明了一個簡單的道理：一種封閉的、不曾與敵對思潮正面較量的馬克思主義，既沒有戰鬥性，也缺乏免疫力；一旦交手，自然是一敗塗地。

在現代化理論的話語結構中，資本主義的結構性矛盾⁷消失了，剩下的只是生產力、（私利計算的）個人理性和個人自由的直線擴展；而社會主義，由於其“非理性”的⁸對個人（財產）自由的約束，只是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一個小小曲折而已。蘇東劇變，似乎最終印證了這一斷言。現代化理論在中共內部（實際上的）話語霸權地位的確立，對其思路演變的作用，不容低估。

在觀察改革時期中共思路的演變時，有兩點值得注意：（1）一黨制決不放棄；（2）執政的合法性只能來自發展生產力（經濟）。從這兩點出發，四個堅持在 20 世紀 80 年代就逐步演變成了（以新加坡模式為代表的）新權威主義。到了 90 年代，在蘇東劇變後出現的強大的國際國內壓力下，為了存活，又不惜全面採用新自由主義的四化（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全球化）政策來推動經濟的迅速發展。

這一決策在 GDP 的增長上取得了鉅大的成功。成功的原因並不難理解。馬克思恩格斯早在 1848 年就已指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發展生產力方面的鉅大潛力：“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南巡講話後 15 年的經濟奇蹟，還有印度同期（因採用類似政策）出現的奇蹟，又一次證明了馬克思主義這一論斷的正確性。

⁷ 參見曹天予編：《社會主義還是社會民主主義？》中〈也談模式和前途〉一文的附錄。

⁸ 按照理性選擇理論，不存在從個人偏好形成集體利益的理性過程。見 Kenneth J. Arrow： *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 New York, Wiley, 1951。

成功的社會後果之一，卻是上文提到的包括新生的（官僚買辦和民間）資產階級在內的“官學產媒精英聯盟”的出現。由於新生資產階級對於中國經濟發展的決定性意義，為了擴大執政基礎、保住一黨制，“三個代表”理論應運而生：資產階級作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被正式承認為中共的階級基礎之一。這一步一跨出，中共就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脫了鉤。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主要目標是消滅資本主義、消滅資產階級。一個資產階級（或以資產階級為其主要盟員的作為階級聯盟）的政黨，怎麼可能去為實現社會主義而奮鬥呢？至少，也得把這個目標推到極其遙遠的將來，使之失去任何實際意義。於是，就出來了個“初級階段長期論”。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提出之初，是為了在公有制計劃經濟佔統治地位的情況下，為市場機制和私有經濟爭得一個立足點：考慮到生產力水平低下的實際情況，為了發展生產力，可以允許資產階級的有限度的存在和市場經濟的某種程度的發展。在公有制為主體、計劃經濟為主導的前提下，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做出這種不得已但卻又是有限度的讓步，對於經濟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不會有根本性的影響。但是，30 來年以後，在生產力已經得到迅猛發展的情況下，把初級階段長期化永久化，其實際含義，只能是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資產階級的長期存在，提供合法的依據。可是由於歷史原因，它與社會主義又好像還有某種聯繫，因而造成一種假象，即中共的思路具有某種連貫性和自治性。這也就是為什麼，在中共還沒有做好正式放棄社會主義承諾的各種必要準備的當前，長期論成了中共宣傳其思路時的一塊主要基石。

思想解放運動之初，誰也沒有預料到，中共的思路，從毛澤東的極左框架裡解放出來以後，會沿著這樣一條軌跡演變。不過，意識形態的演變，從來也不是一個單純的思維過程；它與現實生活中的社會變遷，有著密切的關聯，並且總是也只能是在與後者

的互動過程中，才能完成。為了看清這一關聯，需要了解導致社會變遷的改革開放這一社會實踐。

二、改革開放

20 世紀 70 年代末期中共主導的改革開放，其出發點，是從階級鬥爭為綱時代無休無止的政治運動中脫身出來，集中精力搞經濟建設；並以實現 GDP 翻一番翻兩番等粗糙的發展主義、功用主義的目標來重建執政的合法性。這一決策雖由少數精英做出，卻得到全社會的追認。其原因在於，以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為目標的改革，預設了社會公平；並在實踐中，至少在改革之初，確實做到了使絕大多數社會成員都得到了好處。

可是，表面上的全民共識掩蓋了兩個隱患，其後果只是到了 1980 年代中期以後，才逐漸顯示出來。第一，精英決策實際上排除了自身利益受決策影響的一般群眾的發言權。在只有事後追認沒有事後否決機制的情況下，這一決策過程本身的合法性，存在著嚴重的缺陷。第二，在否定階級鬥爭為綱的同時，無產階級的階級目標，即階級解放和人類解放，特別是實現不受剝削壓迫的社會平等、享受工作安全和作為企業、社會和國家主人翁的政治社會地位，卻在改革的社會目標中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只是發展主義。

為了實現發展主義目標，中共高層的注意力轉向效率。到了提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時，決策精英已經放棄社會公平以求發展效率。在一般群眾沒有發言權、而決策者本身又並不懂得怎麼才能得到真正效率的情況下，政策的創議權實際上落到了一些到西方聽過一些經濟學課、看了一些西方經濟學書、利用這些知識提出種種政策建議的智囊手裡。其中一些有影響的人物，力

圖用西方 1980 年代開始流行的主流經濟學，即可以概括為“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來指導中國的經濟改革。在思想解放運動後人人爭相突破“舊框架”的政治文化氣氛裡，這些建議，由於其短期效益，由於國際思潮的影響和捲入全球化過程後不得不經受的國際資本和國際金融機構所施加的外部壓力，陸續得到了決策者的採納。

在討論改革的經濟社會後果之前，先來看一下改革指導思想中的市場取向和私有化取向。本來，市場只是交易者利益博弈的場所，其存在並不是為了效率，原則上也不一定會導致最佳效率。⁹ 當然，由於價格信號的作用，市場機制在相當寬泛的領域內，從信息處理的角度看，比計劃機制有更高的配置效率。但是市場並不萬靈。它可能失效（如教育、醫療和住房），也有可能造成消極的外部性（如環境資源問題），需要政府有計劃地干預。由於市場崇拜在實踐中造成的各種惡果，人們對此已有認識，政府也在加強干預。因此，企圖擺脫政府干預的自由化傾向，儘管存在且造成了種種惡果，但在一黨制中國的改革中，不是一個最嚴重的問題。

更為嚴重的問題是，把經濟效率局限於市場的配置效率，完全忽略了學習創新效率和整體效率，¹⁰ 從而進入了把勞動力也當

⁹ 阿羅早就指出，市場參與者追逐私利的理性活動，並不必然導致作為外在於個人的集體指標的經濟效率。見 Kenneth J. Arrow: *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 (New York, Wiley, 1951)。

¹⁰ 一個經濟體的學習創新效率，主要表現在其內生的技術進步，因而只能在（廣義的）生產過程中（包括研究開發和協調管理）實現。這裡，勞動者的學習創新能力、參與、和主動精神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因此，在把勞動者當作商品的僱傭勞動制裡，學習創新效率很難得到提高。一個經濟體的整體效率，取決於其制度性質。資本主義制度的驅動力是資本擴張，具體表現為發展主義及其伴生物消費文化。發展主義對環境資源的壓力，反過來又會對進一步的發展施加無情的約束。同時，僱傭勞動勢必帶來社會兩極分化和階級對抗。“把餅做大、全社會得利”，在僱傭勞動制預定了發展果實幾乎盡歸資本產權擁有者及其附庸的情況下，對勞

作市場商品對待的誤區。這一認識上的失誤，與國際國內對國企低效的誤導批評結合在一起，就為改革中的私有化浪潮和僱傭勞動制的實行，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

除了效率考慮以外，為私有化和僱傭勞動制辯護的還有一個國情考慮：私有（包括外資和港資臺資）企業，雖有僱工剝削，卻能提供就業機會。在大批農村人口求僱不得的情況下，不准私企存在或不去大力發展私有企業，豈非書生空談？這個論據其實就是初級階段論的基本論據。國企改制、資本產權入憲和私企業主入黨，依據的其實就是效率（先進生產力）和國情（擴大就業、發展至上）這兩條。

國企效率當然應該提高，就業問題也要解決。但難道只有私有化才是出路？推行改制（私有化）時，受益者當然擁護，但付出代價的受害者，如數千萬下崗工人，何曾有過本來是法定的發言權？有誰問過（且不說尊重）他們的意見嗎？

至於改革的成敗得失，其最大的成就，是經濟的迅猛發展，主要表現為經濟生活中充滿了活力和動力，GDP和社會財富急劇增長，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農村絕對貧困減少，並出現了人數不少的中等收入階層。

從歷史經驗和理念發展的角度來看，認識到市場機制的必要性，並不可逆轉地把中國的經濟轉入市場經濟的軌道，也許可以認為是改革的最大收穫。

同時，由於不搞政治運動、承認個人利益，與階級鬥爭時代、計劃經濟時代每個人生活中的一切都被不同形式地控制相比，個人的獨立自主性，也有了長足的進步。

動者沒有實際意義。在不能通過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或其它手段把內部矛盾轉嫁國外的情況下，勢必衝突不斷、社會動盪。僱傭勞動制與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上述關係，先天地決定了，不管它的效率一時有多高，必定無法持久。

看不到這些成就、收穫和進步，否定改革，想全面倒退到改革前的狀態，不但錯誤，並且沒有任何可能。這是改革凡是派¹¹與質疑改革方向的反思派論辯時佔有的戰略制高點。反思派並不否認改革取得的上述成就，但卻更關注改革中的重大失誤，以及造成這些失誤的根本原因，即主導改革的基本思路背離了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

在為發展主義取向的改革辯護時，凡是派的主要說法是，“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而反思派則總是反問：“難道貧富分化就是社會主義？”作為一項公共政策，改革的一大公認敗筆正是，隨著GDP的增長和社會財富的積累，出現的卻是收入、資源和個人權利在社會成員間的分配不公。當然，不可能有一項公共政策使每個人都得到利益。但是，即使是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早就認識到，決策者在預見到一項公共政策將會帶來成本收益不公平分配時，理應預作謀劃、對受害者給以公平的補償。¹²可是，這個極端重要的補償問題，在發展主義主導的改革過程中，從來也沒有真正排上議事日程。恰恰相反，一些有影響的智囊人物甚至公然聲稱，有些社會階層就是該為改革付出代價。於是就出現了改革初期，特別是改制（私有化）初期，權力和財富的不公分配。¹³這種不公分配，成為此後財富進一步不公分配的起點。隨著僱傭勞

¹¹ 改革凡是派堅持，凡是改革的就是正確的；凡是改革中產生的問題，只有通過沿著既定的改革方向深化改革才能解決。

¹² 這就是有名的卡爾多 — 希克斯補償原則。參見Nicholas Kaldor, “Welfare Propositions of Economics and Interpersonal Comparisons of Utility,” *Economic Journal* 49(September 1939) : 549~552 ; J. R. Hicks : “The Foundations of Welfare Economics” , *Economic Journal* 49 (December 1939) : 696~700, 711~712。

¹³ 當這種不公分配經由非法手段而獲取時，就是所謂“原罪”。但“原罪”只是忽略公正補償的極端形式。比“原罪”更為嚴重、更應該追究的，是改革中只要GDP不要社會公正的指導思想。

動制的重新出現和普遍推廣，財富分配不公又成了收入差距拉開、貧富兩極分化的主要原因。結果是，在GDP持續增長、財富總量迅速積累的同時，利益對抗大量出現、社會矛盾日益激化，甚至出現了某種社會動盪，以致要求“社會公正”的呼聲日漸強烈，並且引起了政府的某種重視。即便如此，從所採取的措施來看，離“公平補償”仍然不啻千里之遙。

在談論從“兼顧”中撿回來的“公平”或“社會公正”時，一些人往往有意無意地掩蓋討論公平問題時必須明確的前提。有兩種公平。一種是承認現有的權力和財富分配格局前提下的公平。比如說，一個私企說好了給打工仔一月800元，到時賴賬或少付就是不公。政府出面，迫使其付足，那就實現了“公平”或“社會公正”。另一種是在社會平等意義下的公平，或社會主義的公正。主要是每個人有參加勞動、不受剝削、享受自己勞動成果的平等權利。¹⁴ 迄今為止，當前改革中所說的公平，就算是全部實現，充其量也只是前一種公平，而決不是社會主義的公平。

這前一種公平的實現，就像改革過程中所有那些在企業管理、市場管理、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質量上的改進和效率上的提高一樣，其主要作用，只能是合法化並進一步強化現有的權力和財富的分配格局。這個格局的一端是壟斷財富和權力的精英聯盟，另一端是億萬只能依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的僱傭勞動者。這一格局的出現，是改革（在制度變遷意義上）的最大失敗，儘管在經濟發展順利的情況下，一般人的生活水平，總體說來，仍然能夠有所提高。

¹⁴ 一些人振振有詞地爭辯，實現社會公正，不等於讓大家平等分享福利，更不是實行絕對平均主義。只有機會平等才是真正的社會公正。這樣空喊機會平等的極端虛偽在於，資源的初始分配不公，勢必導致收入差距和由此轉化而來的能力差距。在這種情況下，哪裡能有真正的機會平等呢？“人人有平等的機會投資股市取得財產性收入”，這對億萬富翁和打工仔真的意味著機會平等嗎？

正因為迄今為止的經濟發展，在付出經濟自主和資源環境等兩方面的鉅大代價後相對順利，這一格局好像也有某種合法性。這一合法性在理論上的表現，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經濟領域內的理論和實踐，無論是從所有制結構〔（所有權和控制管理經營權）兩權分離的現代產權制度基礎上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和經濟運行基本機制（市場機制）來看，還是從分配制度〔（勞動得工資、資本得利潤的）按要素分配〕和生產目的（實現利潤，或發展生產力、實現現代化）來看，與資本主義沒有任何區別。儘管強調社會公正，對政府行為缺乏規範、官員利用職權設租尋租、官商結合的權貴資本主義等所造成的極度的社會不公有所抑制，儘管科學發展觀，¹⁵ 對粗糙的發展主義帶來的種種弊端有所匡正，但是在資本主義框架內實行的這些指導方針，並沒有跳出福利國家調控市場的框子。任何一個具有社會民主主義傾向的政黨，都在這樣做。但是，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框架內，正像福利經濟學家帕累托指出的那樣，由於造成不平等的基本力量（資本）強大到國家干預不能影響的地步，這些方針指導下的調控措施，只能緩和但不能解決資本主義的結構性矛盾（勞資對抗和資本的盲目擴張）。從某種意義上，人們可以說，社會公正問題和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標誌著中共在經濟問題上已經從1990年代中後期的新自由主義取向轉為社會民主主義取

¹⁵ 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以人為本，造福人民。但以人為本的實際內容，往往局限於對住房、醫療和教育等人們的直接利益表示關心，而對於工農大眾的根本的階級利益（勞動權和不受剝削壓迫的平等權利等），則隻字不提，因而並不構成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實質性挑戰。

向。這就是為什麼有人認為，換旗的經濟基礎已經具備。

在思想文化領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宣稱的核心價值體系裡有人權、民主、平等、博愛等普世價值，有改革創新的時代精神，有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還有和諧文化和中華文化。當然，還有處於指導地位的馬克思主義。而後者，據說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區別於社會民主主義的兩個主要特徵之一。可是這裡的馬克思主義，指的是其中國化後的最新成果，是沒有階級分析、不反對資本主義、沒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只有發展生產力這一條的“馬克思主義”。這樣的“馬克思主義”，哪一個發展主義經濟學家，哪一個社會民主黨人，會覺得不能接受？！正因為這個原因，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熱心的宣傳家們，也不禁哀嘆，在理想信念問題上，要人們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區分開來，認同前者而不認同後者，任務異常艱鉅。這也就是為什麼有人認為，換旗的思想基礎已經具備。

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區別於社會民主主義的另一個主要特徵，即共產黨的領導或政治生活中的一黨制，才是唯一的真正實質性的區別。據目前網上的統計，現在全國人民關心的第一大問題就是對權力異化的監督制約。¹⁶ 監督制約，說到最後，就要追到權力的來源問題，或共產黨一黨執政的合法性問題：為什麼你有執政的壟斷權呢？誰授權的？網民的這一關注，表達的是對實行社會主義憲政民主的深切期望和強烈要求。換旗派提出實行憲政民主、直接挑戰中共一黨執政的合法性，與一般群眾的期望和要求，不無平行之處。

換旗派作為體制外精英的政治代表，不滿意體制內精英壟斷

¹⁶ 據南方網 2007 年 10 月 15 日報道：“網友對十七大最關心的幾個問題，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對權力進行監督和有效的制約。第一大類的問題是反腐敗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

政治權力、滯留於新權威主義模式中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對於他們來說，新權威主義模式，最多只是個過渡階段，一個中間站。對於發展資本主義經濟來說，理想的政治模式，當然是西方的憲政民主、三權分立。特別是在授權問題上，不承認任何政黨特權，只有政治上平等的個人組成的政黨通過民主程序才能得到授權。由於“三個代表”理論為資本家入黨打開了大門，黨內認同這一模式的聲音逐漸增大。¹⁷ 這也就是為什麼，有人認為換旗的組織基礎（或階級基礎）已經具備。

中共一黨執政，歷史上有其合法性。領導革命取得勝利，推翻了剝削階級的壓迫統治，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發展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和文化。所有這些成就，都得到了人民的擁護。由於沒有任何別的政黨，只有中共，才是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者，中共一黨執政的合法性，確實得到了人們的認可。可是，當中共離開了社會主義的軌道，企圖用以資本主義方式取得的 GDP 增長，來為自己取得一黨執政的合法性時，問題就出來了。中共現在正在做的事情，原則上，任何一個資產階級的政黨，特別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政黨，都會做。並且，由於沒有權力壟斷，有可能做得更好。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一黨執政的合法性又在哪裡呢？讓各黨自由競爭，以績效取得選民的授權，不是更加符合時代潮流世界潮流嗎？

對於實行憲政民主這個首要問題，中共以科學社會主義的名義，把它列為第一號禁區，不准討論；並以種種黨改許諾和“依法執政”、“人事制度改革”、“任命黨外官員”、“政企分開”等一黨制框子內操作層面上的改革作為替代物，以慰人心。可是，沒有憲政民主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還是科學社會主義嗎？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有必要先問一下，到底什麼是科學社會主義？

¹⁷ 由於現存的權力架構和提昇機制，入黨的資本家不容易很快進入權力中樞。同時由於意識落後於存在，這些人大體上保留著體制外人士的心態。

四、科學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根本區別在於，勞動者擺脫了剝削和壓迫，能夠控制自己的命運。正像君主立憲體制內君主開明了不等於實行了共和制一樣，社會民主主義體制內的資本，受到民主權力的節制，並不就是社會主義。至於憲政民主，下文將要指出，在立憲主體、倫理基礎和指導原則等方面，社會主義的憲政民主，與資本主義（包括社會民主主義）的憲政民主，存在著一系列實質性的區別。

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社會主義學說，被稱為科學社會主義，在歷史上，主要是與法國的聖西門傅立葉和英國的歐文等人創立的空想社會主義相對而言。與空想主義者把社會主義學說看成主要是對未來理想社會的設想不同，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學說，通過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結構性矛盾及其階級表現的考察，指出了它的發展趨勢和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成了一門埋葬資本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科學。說它是科學，並不是說它是只有少數精英才能掌握的有關宿命的歷史規律的絕對真理。這既與科學的反對教條、反對權威的批判精神相衝突，也完全背離了馬克思主義承認主觀能動性、反對宿命論的革命精神。¹⁸ 說它是科學，主要是說，它根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固有矛盾及其階級表現（勞資鬥爭）存在的事實，和矛盾發展的內在邏輯，指出了無產階級埋葬資本主義、實現階級解放和人類解放的可能性。而這種可能性能否變為現實，則完全取決於無產階級能否在階級鬥爭中覺悟起來，認識到自己的歷史使命，奮起鬥爭。集體主義的階級覺悟的形成，是一種價值理性選擇。它不可能通過個人私利的博弈，而只能

¹⁸ 參見曹天予編：《社會主義還是社會民主主義？》中〈也談模式和前途〉一文的附錄。

是在外部共同敵人壓力的催化下，才有可能完成。階級覺悟與個人利益有關，但又超越了個人利益，成了一個結構性的範疇。¹⁹ 從作為一門科學的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來看，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及其價值指向（規範），只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結構性矛盾（事實）在社會成員意識中的表現而已。對於事實和規範間關係的這一說明，表明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性和價值理性的一致性。

無產階級階級覺悟的價值指向，是階級解放和人類解放。即經濟上消滅剝削，社會政治生活中消滅特權和壓迫，人人平等。埋葬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都是為了實現這個理想，而不是為了任何別的、抽象的、超階級的財產、人權、民主、自由、博愛等普世價值。科學社會主義的這一價值定向，對於社會主義的制度設計，施加了剛性的約束。對這一約束的任何背離，都是對科學社會主義的背叛。至於馬恩本人對未來社會的一些具體設想，倒不一定是金科玉律、絕對真理。實際上，其中的失誤不在少數，應該根據情況，予以修正。

第一，馬克思否定市場，強調計劃，認為計劃體現了社會主義區別於資本主義（由市場盲目力量支配的）生產無政府狀態的最大優越性。可是實際上，市場機制固然有種種問題，需要國家調控指導，作為處理供需信息、配置資源的一種機制，其本身大體上說來卻是價值中性的。²⁰ 在經濟活動日益複雜的現代社會，

¹⁹ 純從私利博弈角度來看，做工賊、逃兵和叛徒，應該是唯一“理性”的選擇。工賊和叛徒當然存在。但不計個人犧牲的階級覺悟的存在，也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這一事實存在的本身，對於從方法論個人主義出發的西方經濟政治社會倫理學說來說，是一個無法面對的挑戰。

²⁰ 當勞動力作為商品進入市場時，市場成了資本主義僱傭勞動制的一個核心環節。但如果勞動力不是作為商品，而是作為與資本平等的主體，進入市場，那市場就成了社會主義經濟的運行機制。市場競爭，是經濟生活中活力和動力的源泉；但優勝劣汰，確實又會造成分化。可是，第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不存在剝削，

企圖完全排除市場、只靠計劃，不無空想成分。

第二，為了實現計劃經濟，馬克思把生產資料公有制，認作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石。當前國內各派論戰時，口頭上無不認同這一條。連換旗派想為私有化辯護時，也還得拉上初級階段論來打掩護。

公有制，主要指全民所有制，具體表現為國有制或實際上的國有制。²¹ 在經濟活動由社會主義原則導引的情況下，公有制是國家對經濟實行計劃安排和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對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能夠發揮鉅大的積極作用。

但與此同時，國有制不僅是國家主義在經濟生活中的一種表現，而且是國家主義的經濟基礎。而國家主義，由於其載體是一個龐大的科層結構，儘管是革命勝利後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領域向社會主義過渡時不得不採取的形式，其本身卻並不同於社會主義。特別是應該看到，這一科層結構，在國有制的支撐下，又是權力異化、產生官僚特權階層、產生新剝削階級的溫床。因此，如何對待國有制，實際上是如何推動國家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這一複雜問題的一個方面，值得認真研究。

應該指出的是，馬克思崇尚公有制，其理論上的出發點是所有制決定論。可是，這個出發點是錯誤的。資本家擁有生產資料這一事實本身，並沒有先天地決定了他就能剝削工人。使剝削成為可能的是僱傭勞動制。而僱傭勞動制，則是以政府暴力為後盾的一種特定的法權關係。在另外一種政治權力的安排下，在另外

因而分化程度不會太嚴重；第二，政府可以採取措施對分化的消極方面適當處理（詳見關於勞動產權制的討論，曹天子編：《勞動產權與中國模式——當代馬克思主義在挑戰中發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6月）。

²¹ 即那些名義上不歸國有、實際上卻全由國家控制的所有制形式，如計劃經濟時代的集體所有制。

一種法權關係中，如果工人可以租用資本家的生產資料，資本家只能拿到租金，而利潤則全歸工人所有，那麼生產資料的資本家所有，就不會導致剝削。這也就是說，離開了特定的政治法權關係，誰擁有生產資料，只說明了誰擁有生產資料，什麼別的也不說明。因此，分配的基礎，或剝削與社會不公的根源，並不在所有制，而主要在政治法權關係，即體現在例如國務院頒發的《公司法》、《企業財務通則》和《企業會計準則》等具有法律效力的條文中的勞資間的政治法權關係。²²

否定了所有制決定論，我們就能理解，為什麼公有制本身並不能保證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²³ 而私有制，只要不涉及關係到國家安全的戰略產業，或國民經濟支柱中的骨幹企業，也並不是絕對不能成為社會主義經濟的產權形式之一。²⁴ 這裡，起決定作用的是政治法權關係，而不是所有制本身。這一觀點，雖然不符合對歷史唯物主義的庸俗理解，但卻並不違背對基礎與上層建築關係的辯證理解。

第三，馬克思認為，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是按勞分配。可是，如果只有勞動才能得到分配，那誰來投資？資本怎麼積累？擴大再生產怎麼實現？在市場經濟中，這完全行不通。在計劃經濟中，工資以外為了擴大再生產而作的扣除（積累），儘管用了國家、

²² 參見曹天予編：《勞動產權與中國模式——當代馬克思主義在挑戰中發展》第116頁。

²³ 如果國企利潤（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被特權階層所侵吞，那這與資本家的剝削，就只有形式上的不同。

²⁴ 所有制決定論還有另外一種表現形式。新自由主義者斷言，公有必定低效，要高效只能私有。由於在大型企業中，管理效率主要與企業的治理結構有關，而與所有制或產權結構沒有不可分割的關係，這一斷言沒有事實依據，只是推動私有化時採用的一種蠱惑人心的說法而已。參見曹天予編：《勞動產權與中國模式》第122~123頁中對這個問題的討論。

社會和人民等名義，究竟是按什麼原則安排這種積累的，並不清楚。其實，合理的分配形式，只能是按要素（勞動、資本及其它）分配扣除了成本（工資和其他要素的損耗）後的剩餘或利潤或增量產權；在分配利潤或增量產權時，勞動作為要素之一，享有與資本平等的權利。為此，社會主義的法權關係應該保障勞動產權和資本產權的平等地位。這樣，不管企業所有權的起點是公有還是私有，勞動者擁有企業生產資料的份額會穩步增加。經過一段時間，就會出現一種（主要以所有勞動者對生產資料擁有個人份額形式出現的）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制。²⁵ 這種社會所有制，與國有制相比，有種種優越性。特別是，它將削弱國家主義的經濟基礎，使權力異化在經濟上成為不可能。

糾正了馬恩本人具體設想中的上述失誤後，科學社會主義在經濟領域內的目標是，以勞資合作²⁶ 的形式，實現社會經濟權力（從資產階級和國家官僚手裡）回歸社會所有。這一目標直接侵犯了資產階級和異化了的行政權力（某些國家官僚）的經濟權益，勢必遭到他們的殊死抵抗；不摧毀他們的抵抗，這一目標不可能實現。因此就必須堅持共產主義政黨的領導，無產階級的統治和科學社會主義的指導地位。其理由如下。

科學社會主義經濟綱領的核心是勞動產權，而實行勞動產權的前提則一是國家主導，二是群眾鬥爭。國家必須動用政權的力量，把勞動產權列入憲法，從法權和制度上確保其貫徹實施。同

²⁵ 它也正是馬克思本人追求的、在“生產資料共同佔有基礎上重新建立的個人所有制”（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 832 頁）。由於按要素分配，企業的初始產權在絕對數量上也會增長，只是其相對份額會逐步減少。更詳細的討論，參見曹天予編：《社會主義還是社會民主主義？》中〈勞動產權與改革的目標模式〉一文。

²⁶ 請注意：在按要素分配的社會主義法權關係中，資本擁有者（包括所有的勞動者），因為沒有也不能（用資本去）剝削，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資產階級了。

時，國家必須堅持社會主義的價值目標，絕不因為任何其它目標（如 GDP 的增長之類）而犧牲工農利益。而工人農民及一切其他勞動者，也必須組織起來，為自己的利益與官商精英作日常的、面對面的鬥爭。可是，如果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沒有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不動用無產階級政權的力量，勞動者用什麼去團結自己戰勝敵人（資產階級的資本權力和變質官僚的行政權力）？

在中共壟斷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權並實行一黨制的情況下，上述原則三合一為黨權一條。根據馬克思主義關於異化的一般理論，黨權作為一種精英權力，有異化變質、離開社會主義方向、變成新的剝削壓迫權力的可能。因此，實行憲政民主、對黨權監督制約，本來是科學社會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其根本目標，是實現政治權力（從精英黨手裡）回歸社會所有。否認異化可能、²⁷ 拒絕憲政民主的任何主義，絕對不是科學社會主義。

1949 年革命成功後，中共本來應該盡快實行憲政，從民主授權的意義上，取得執政的合法性。可是由於列寧主義的精英情結，又對階級鬥爭的形勢作了不恰當的估計，錯過了機會。

現在很多人在談論憲政民主。問題是憲政民主究竟是什麼？換旗派認為憲政民主是人權、民權、產權、自由、民主等普世價值的制度體現，大同小異。²⁸ 但馬克思主義則認為，憲政民主具

²⁷ 這是 1983 年清污運動的主題。

²⁸ 自由派比換旗派更坦率。他們問道，科學社會主義只承認一黨權威，不允許多黨競爭，還談什麼民主？但是，民主的要義不在競爭，而在平等參與。資本主義在經濟市場和政治“市場”中確有競爭，但卻難以形成作為民主價值基礎的公意或集體意志或人民主權。市場的這一反民主特性決定了，要民主，就得限制市場原則、反對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Joseph Schumpeter 早在 1943 年就已認識到，資本主義與“民主和社會公正”不相容，因而悲哀地承認，資本主義必敗，社會主義必勝。見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Allen and Unwin, London,

有階級內容；社會主義的憲政民主與資本主義（包括社會民主主義）的憲政民主，在立憲主體、倫理基礎和指導原則等方面，存在著一系列實質性區別。

首先，科學社會主義的憲政民主，其出發點是無產階級的集體主義，目的是為了實現階級解放和人類解放，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因此它的出發點既不能是以個人權利為中心的自由主義，因為這將立即導致對社會主義原則的根本否定；也不能是籠統的民族主義或全民利益，因為通過發展主義而實現的民族復興和社會福利的整體增長，往往會掩蓋殘酷的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與社會主義原則南轅北轍。因此社會主義憲政要處理的頭等要務，就絕不是自由主義者念念不忘的限制政府權力、保障個人自由；而是處理階級關係（即解決國體問題）：確認工農大眾的國家主人地位，確保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成果，即剝奪了剝削者壓迫剝削勞動者的權力，在任何情況下不致喪失。²⁹

其次，誰來立憲？誰是立憲的主體？當然應該是工農大眾，而不是財富精英和權力精英。實際上的立憲過程，可以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但人民大眾必須自下而上地組織起來，成為立憲過程的主體。只有這樣，才能確保黨確實聽到工農的呼聲，確實

1943）。這一認識，其實也正是美國實行新政、歐洲流行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想背景。但從1950年代開始，新興的理性選擇學派，以（只追求私利最大化的）市場行為為模式，把個人主義倫理學推到極端，並用博弈論“科學”地論證了集體利益的不可能性，從而否定了民主與共和的價值基礎。這一學派的觀點，既為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也為最小政府學說，提供了依據，成了當代西方思潮中的主流。但它同時也摧毀了民主的程序基礎：個人投票等政治參與行為不合私利最大化的理性原則，搭便車得到鼓勵並日漸流行，投票率愈來愈低。在西方的民主缺失日漸明顯、危機感日漸深重的情況下，不無諷刺意味的是，東方一些人對它卻愈來愈崇拜。

²⁹ 西方立憲之初對公民權的財產資格限制，處理的也是階級關係，即確保財產階級對窮人的階級統治。

代表工農利益，而不是（在任何藉口或名義下）代表剝削階級的利益制定憲法。

第三，立憲的基本原則，是取消精英特權、確保公民在享有各項權利（如自由、收入、財富、機會和權力）時的平等地位。這既是社會公平的倫理基礎，也是民主授權的法理基礎。否定了精英特權，一切公眾權力（包括共產黨的執政權）的源泉，只能是公眾本身。任何公眾權力，只有得到公眾通過民主程序的授權，才有合法性。

那麼，根據科學社會主義，共產黨在憲政民主架構中該居何種地位？作為唯一忠於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的政黨，共產黨應該是社會主義憲政民主的守護者。它沒有背叛社會主義的特權，但卻有杜絕一切背離社會主義方向的政治行為和法律條文的責任和作出否決的義務，並以此來把握整個國家的社會主義方向。至於施政權，則必須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根據共產黨內各個派別的具體情況，定期擇優授予。

五、中共向何處去？

大體上說來，中共推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其與科學社會主義的距離，要比與社會民主主義的距離大得多。現在有好多人在期望（和推動）中共出一個戈爾巴喬夫或蔣經國，把中國從“一黨專政的死胡同”裡拖出來，把中國引向“憲政民主的光明大道”。迄今為止，還看不出中共內部有誰想當戈爾巴喬夫或蔣經國。但事情的發展有它內在的邏輯。當年進入的一些認識上的誤區，已經造成了社會後果。新生的權勢集團能量鉅大，已經足以影響中共的走向。從十七大閉口不談階級分析、不談社會主義理想、卻大力鼓吹“財產性收入”的情況來看，前景不容樂觀。改革時期

的中共，從新權威主義出發，通過換旗為社會民主主義，正式變成一個資本階級政黨的可能性不是太小。

但是，回到科學社會主義的可能性也還是存在。首先，作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一部分的、以權貴資本主義形式出現的、中國的依附性資本主義經濟，其結構性的矛盾，正在急劇惡性發展。一旦外部環境有所動盪，經濟危機乃至社會政治危機必不可免。到那時，重新審視方向道路的呼聲在黨內必然會高漲起來。

其次，為改革付出慘痛代價、其自身利益受到鉅大損害、對社會不公憤憤不平的工農大眾，以及代表他們利益的黨內外忠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的馬克思主義者，也在熱切地期望著中共回到科學社會主義道路上來。

關鍵是如何把這些力量組織起來。其第一步當然是思想文化動員或話語鬥爭。用陳舊的斯大林主義的語言，與陳舊的社會民主主義語言或新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語言作鬥爭，不可能有成效。其原因很清楚，中國之所以走上今天的道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舊語言（所表達的舊的經濟政治綱領）的失敗引起的。當然，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如階級分析和資本主義的結構性矛盾等等，是科學社會主義的戰略制高點，必須佔領，不能放棄。但是，對於市場經濟中如何進行制度創新、確保經濟活動的社會主義方向；在權力異化已經惡性發展到出現新剝削階級的情況下，如何從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手中，把憲政民主的旗幟奪過來，讓工農群眾對公眾權力進行監督制約，而不是讓財富權力控制政治權力，都是值得認真研究的大問題。只有在這些問題的研究上有所突破，發展出一些新的語言來，馬克思主義者才有可能在這場話語鬥爭中擊敗對手，中共才有可能回到科學社會主義的道路上來。